

梁启超王国维简论

- 一 如何评价
- 二 启蒙宣传家
- 三 新史学的代表人物

一 如何评价

中国近代人物都比较复杂,它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代表更是如此。社会解体的迅速,政治斗争的剧烈,新旧观念的交错,使人们思想经常处在动荡、变化和不平衡的状态中。先进者已接受或迈向社会主义思想,落后者仍抱住“子曰诗云”、“正心诚意”不放。同一人物,思想或行为的这一部分已经很开通很进步了,另一方面或另一部分却很保守很落后。政治思想是先进的,世界观可能仍是落后的;文艺学术观点可能是资产阶级的,而政治主张却依旧是封建主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构成了中国近代思想一幅极为错杂矛盾的图景。用简单办法是不能正确处理这种图景的。

关于梁启超和王国维的许多评论,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1949年以来,对他们两人的评议虽多,但基本论调则几乎一致,即作为否定的历史人物来对待和论述。道理很明显,也很简单,梁启超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保皇党,辛亥以后也一直站在反动派方面。一提及王国维,拖着一条长辫自溺于昆明湖的遗老形象便浮现在人们眼前,更何况他鼓吹过叔本华,写过充满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红楼梦评论》?否定和批判他们,“肃清”他们宣扬的世界观和政治思想,便成了“理所当然”。

然而,问题决不如此简单,即使“先进人物”也有应该批判的思想,落后者也可以在某些方面作出重要的贡献。因之,评价历史人物,就应不止是批判他的政治思想了事,而应该根据他在历史上所作的贡献,所起的客观作用 and 影响来作全面衡量,给以准确的符合实际的地位。

如果从这个角度和标准着眼,梁启超和王国维则都是应该大书特书的肯定人物。他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所起的客观作用 and 影响,其主要方面是积极的。这一点几十年来大量文章却几乎从未如此谈过。

二 启蒙宣传家

梁启超在戊戌时期,作为康有为的弟子和得力助手,积极参加变法维新活动,其进步性人所公认。洪(秀全)杨(秀清)、康梁和孙(中山)黄(兴),是中国近代三大运动中联在一起的著名的领导人物。从一开始,梁启超活动的特点,就主要是在宣传。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在思想方面,在思想方面的地位,又在宣传方面,即并不在有多大的独创性(与康有为不同),他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宣传家。《变法通议》和《时务报》作为当时的众口传诵著名文章和刊物,起的正是这种宣传作用。他当时所宣传的大都是康有为的思

想和主张。梁启超在《变法通议》等文章中,以不同于当时文坛的新文体,即更为顺畅流利、急切锐利、富有情感、不避俚俗的语言,大声疾呼非变法不可,“法何以必变?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从而,“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变法通议》)。这在当时,确乎发聩震聋,动人心弦,是封建古国的第一声爱国启蒙。这一点许多论著都讲到和承认,本文不拟多讲。

因为本文认为,梁启超上述戊戌时期的功劳,并非他在历史上的主要业绩。我仍然坚持二十年前的一个论点,即:“《时务报》时期,梁氏的政论已风闻一时,在变法运动中起了重要的宣传作用。但梁氏所以更加出名,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更大,却主要还是戊戌政变后到1903年前梁氏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撰写了一系列介绍、鼓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的原故。”(《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7页,重点原有。)

梁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我以为,主要应根据这一阶段来判定。1898年至1903年是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是他一生中最有群众影响,起了最好客观作用的时期。时间虽极短,但非常重要。他这一时期的论著,对连续几代的青年都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时期内,他一定程度上不再完全受康有为思想的支配控制,相对独立地全面宣传了一整套当时是先进的、新颖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广泛而富有成效的启蒙宣传工作是如此不可抹杀,它几乎抵消了梁一生的错误而有余,因为后者在当时历史上所起的消极作用比不上前者的客观积极作用。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流亡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及一些革命派人士,经常混在一起。梁启超当时的表现和思想情况,的确夹杂着某

些革命思想,这一点革命派和梁本人都承认:

“(梁)从中国来,与孙君游数月,乃大为所动,凡尽弃所学,由是乃高谈破坏”(《民报》伍号《斥新民丛报之谬妄》)“……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于此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1902年10月与康有为书,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简称《年谱》)。

从梁启超与康有为私人书信中可以很明白地看出,梁当时确实一度脱离了康的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的控制。从康的大同学说、保教理论^①,到改良主义政治主张,都为梁所怀疑、动摇甚至反对。好些论著把梁这段表现一概斥之为“投机”“伪装”“欺骗”“两面派”等等,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因为如果是那样,就根本没有必要在与康的私人书信中进行表白和辩论^②。所以,尽管在1903年秋冬梁从美洲回后发表声明,又迅速回到康的路线,但在这以前的短促时期(1898—1902)内,梁的确发表了一系列在一定程度上背离康的改良主义政治路线的文章。梁在这些文章中激烈地揭发“逆后贼臣”的清朝政府剥削人民“腹我脂、削我膏、剥我肤、吮吸我血以供满逆党之骄奢淫佚”(《论刚毅筹款事》)的深重罪恶,指出帝国主义勾结利用清朝政府,“使役满洲政府之力以压制吾民”(《瓜分危言》)的阴险手段,呐喊着“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沌之政体破坏而

① 如:“……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轅也。……思以数年之功,著一大书,揭孔教之缺点,而是以正之,知先生必不以为然矣”(《年谱》)。

② “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清代学术概论》)。当然,梁当时这种背离也仍有一定限度,更多是动摇在康孙之间。1902年革命派举行“支那亡国纪念会”,梁同意参加却不愿公开签名,典型表现了这一点。

齧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蛾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借”(《新民说》),号召人们去“破坏”、“暗杀”;“不破坏之建设未有能建设者也”(同上)。梁氏许多论著的确起了促使人们去仇恨清朝政府、倾向革命的影响。^①

这也正如梁后来所追溯的:“辛丑之冬,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创痍既复,故态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犹记曾作一小说,名曰新中国未来记,连登于该报者十余回,其理想的国号,曰大中华民国,……”(《民国元年十月莅报界欢迎词》)。

梁氏这一时期的论著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时,自由主义改良派与革命民主主义还未完全划清界限,他们在要求改革、反对现有政权上有着某种联合。正如革命民主主义者在这时还有某些自由主义的动摇一样(如陈天华对清朝的残存幻想^②),刚受过封建反动统治的严重迫害的自由主义者在这时也就能夹杂着某些革命思想因素和情绪。例如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的小说中,一面“其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取黄帝子孙能自强立之意”),另一方面,这个“罗在田者藏清德宗之名,言其逊位也”,实即要光绪皇帝来当第一代的总统,以作为过渡阶段。正如不能责备陈天华对清朝政府的残存幻想一样,也不能硬说梁启超这时靠近革命是“伪装”、“欺骗”或“投机”。这种现象也并非

① 尽管梁曾解释说:“欲导民以民权也,则不可不骇以革命,……吾所欲实行者在此,则其所昌言者不可不在彼”(《敬告我同业诸君》),这是人们常引用的材料,但此心理动机的真实性和此辩解的可靠性(特别用在1903年前)是大可怀疑的。

② “去岁以前,亦尝渴望满洲政府变法溶和种界以御外侮,然至近则主张民族者则以满汉终不并立,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绝命书》)。

个别或偶然,它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当时甚至连康门中的著名保守分子也可一度接受革命派的影响,“徐(勤)、欧(桀甲)在文兴所发之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薈栗,……满纸清贼之言,盈篇溢纸。……树园,吾党中最长者也,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同门之人,皆趋于此,……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年谱》)。革命与改良、反满与保皇,两条政治路线、两种政治思想和政治派别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才逐渐由潜在的分歧变而为公开的对立和直接的斗争。1900年革命派的《国民报》对改良派就有批判,自立军事件后就有好些人痛骂康梁,但真正作为路线的斗争,却应以康有为《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①和章太炎《驳康书》为起点,而以梁启超美洲回后发表声明^②和孙中山《敬告同乡书》,明确揭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不能易位”公开决裂为正式转折,到《民报》与《新民丛报》的直接对垒而达到高峰的。与改良派早有分歧的章太炎,便也承认,在1897年“余常持船山黄书相角,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宗旨渐分,然康门时或悦言革命,逾四年始判殊方”(《章太炎自编年谱》),逾四年正好是1903年。在1903年以前梁的政论与革命派的宣传大体还不十分矛盾,打击的矛头还是共同指向清朝政府,尽管立场、意图、言论、论证、主张均与革命派有所不同。

然而,梁启超这一时期在思想战线上的主要作用,还不在于他宣传了多少反满急进主张,因为他毕竟没有革命派宣传得多。他的

① 《新民丛报》虽于1902年8月以《辩革命书》刊载康有为此文摘要,但梁思想上并未完全接受。

② 1903年6月27日梁给蒋观云信中已有“弟近数月来,惩新党纷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年谱》)。到十月从美洲回日本后,“先生自美洲归来后,言论大变,从前所深信之破坏主义与革命的排满主义,至是完全放弃,这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转变,以后几年内的言论和主张,完全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立论。”(同上)

主要作用在于,他作了当时革命派所忽视的广泛思想启蒙工作。他有意识地广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各种理论学说,作了各种《泰西学案》,同时极力鼓吹了一整套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思想。如果说,严复的《天演论》以进化论的世界观激励起人们救国自强的热情;那末,梁启超当年的大量论著则把这一观念更为具体地、生动活泼地贯彻和灌注到各个方面。在这一时期中,梁根据自己当时如饥如渴地吸取和了解的西方的思想学说,结合中国的局势情况,通过他特有的流畅明白“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学语言表达出来,就远比严氏的严谨翻译,更易为人了解、喜爱和接受。虽在清廷严禁下,《新民丛报》不胫而走,暗中畅销国内,销数高达一万数千册,在当时不能不是巨大数字。梁向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鼓吹新鲜的资产阶级社会道德观念。如在脍炙人口的《新民说》中,宣传要“新国”必先“新民”,人们必须具有资产阶级爱国思想和独立自由的奋斗精神,要人们去“爱国”“利群”“尚武”“自尊”“冒险”等等,并人人“自护其权利”,“勿为古人之奴隶”,痛斥汉学宋学和种种封建传统学理观念,号召“勿为世俗之奴隶”,而大力发挥勇敢进取意志,宣传了一整套朝气蓬勃的资产阶级社会意识和精神状貌。由于对象是当时正大量涌现的一批批近代学生知识分子,梁的这种宣传,结合对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大量介绍,完全符合了需要,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梁启超以其数量极大的作品成为当时青年中最有影响的人物。

例如,1902 年梁启超的论著,“除了政治文章以外,关于学术方面者,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和《新史学》两篇,其介绍西人学说者有《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乐利主义者泰斗边沁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和《论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数篇。所为名人传记有《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

《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张博望班定远合传》，《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传》。其言地理者，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文艺作品中除《新中国未来记》外，有《世界末日记》，《新罗马传奇和侠情记》三篇……”（《年谱》）。

这是一张相当复杂的书单，却居然出自梁一人一年之手。不像严又陵译作那样专门，也不像章太炎《馥书》那么深邃，却以通俗浅近顺畅华美的文笔，极为广泛地介绍、评议和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培根、笛卡儿、康德；从孟德斯鸠到达尔文；从边沁到孔德；从希腊、马其顿到意大利、匈牙利，各种西方哲学、人物、历史、地理，都被梁广泛地介绍过来。这种大量新鲜知识打开了原来只知四书五经孔孟老庄的封建传统文化的人们（特别是青年）的眼界，看到了世界原来有那么大那么多和那么丰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新鲜知识中，介绍进来了大量新鲜的理论、观点、标准、尺度，使人们知道了原来除了古圣昔贤之外，世界还有那么多精深博雅的思想和道理、原则和方法。也正是从封建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这种对比映照中，才使人们更感自己民族的落后，才更强烈地燃烧起救国和革命的热情。一切夜郎自大、坐井观天、抱残守缺、因循守旧，都在这种知识和观念的宣传介绍中不攻自破，褪去神圣的颜色，失去其不可侵犯的尊严，而受到理性的怀疑和检验。这就正是启蒙的力量和启蒙的意义。所以，当革命派由于集中全力于政治斗争和武装起义，做炸弹、入新军、联合会，支配了大多数成员的精力和注意，相对忽视了思想启蒙工作^①的时候，这个工作就反而由改良派特别是梁启超所自觉承担起来。

① 只有鲁迅十分重视这工作，但当时却不为人（革命者）所理解。当时革命派的报刊也有许多这方面的介绍宣传，但毕竟后于梁启超，也没有梁那样自觉重视。

梁说：“以为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中国之不振，由于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这里所谓“德育”，主要是与封建传统对立的资产阶级人生社会观念；所谓“智育”，主要是西方的理论学说，梁并明确提出“重教育为主脑，以政治为附从”，这里所谓教育，指的就是思想教育。梁在这方面的确作了有益工作。这种启蒙工作的意义不应低估，它构成当时人们（主要是青年一代）思想发展前进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过渡环节。在政治上，它安排了一根由不满清朝政府而走向革命的思想跳板，在观念上，它安排了由接受初步启蒙洗礼而走向更开阔更解放的思想境界的媒介。

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因为社会变动的迅速，它必需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几百年来发展的全程。从温和的自由主义到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从启蒙思想到社会主义，都是一个十分急促短暂的行程。它是那样的神速变迁和错综复杂，以致一方面根本不能有足够的条件和条件来酝酿成熟一些较完整深刻的哲学政治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人们也常常是早晨刚从封建古书堆里惊醒过来，接受了梁启超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洗礼，而晚上却已不得不完全倾倒在反对梁启超的激进的革命思想中去了。然而，梁启超却反而因此构成了一个不可缺少的思想环节。梁和《清议报》、前期《新民丛报》的这种客观历史作用是不容否认的^①。当年鲁迅一代受过他的影响：

他（梁）攻击西太后，看来接近排满，而且如他自己所说，

① 如：“杭州开化之速，末有如去岁之甚也，……推其故，溯其因，乃恍然于新民丛报之力也”（1903年《新世界学报》第3期《与陈君逸庵论杭州宜兴教育会书》）。

笔锋常带感情，很能打动一般青年人的心，所以有很大的势力。癸卯（1903）年三月鲁迅给我一包书，内中便有《清议报》汇编八大册，《新民丛报》及《新小说》各三册……（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

胡适一代受过影响：

我个人受了梁先生的无穷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与很高等的文化。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的大势”篇章给我开辟了一个新境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其他学术思想（胡适《四十自述》）。

郭沫若一代也是受过影响的：

……但那时候他（指章太炎）办的报是禁书，我们怎么也不能得到阅读机会。

《清议报》很容易看懂，虽然言论很浅薄，但他却表现得很有一种新的气象。那时候，梁任公已经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很鄙视他，但却喜欢他的著书。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俾士麦之余，便是崇拜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

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

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少年时代》)。

如本文一开头所指出,中国社会处在如此复杂的过渡时期,事情经常如此错综矛盾,心里“鄙屑”梁的政治立场,却仍然可以在思想上接受他的启蒙洗礼。这当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极富代表性的好几代青年知识分子。因之,我始终不能同意某些学者完全抹杀梁的这种客观历史作用,把以《新民说》^① 为代表的梁的这一时期的思想启蒙工作,简单斥责为意图反动,手法狡猾,反正是坏得很、坏极了。例如说他“发表新民说,目的是在阻止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接受革命思想”,“他就将奴役中国人民的心理和身体的专制统治以及有其统治基础的各种制度的罪恶轻轻地开脱掉,而把全部罪恶归之于中国人民自己的思想了”(胡绳武、金冲及《关于梁启超的评价问题》,《学术月刊》1960年第2期)。这种说法虽以批判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为题目,其实却并不符合历史和梁本人当时的全面事实,也解释不了上述鲁迅、胡适、郭沫若的亲身经历。

梁启超当时这种启蒙工作,不仅在一般的思想观念领域中,而且还突出表现在文艺和史学这两个重要方面。梁启超是在中国近代最早高度评价和极力提倡小说创作的人,也是最早在中国主张用

① 《新民说》全文较长,写作也跨了年限,基本写于1902年,结尾于1903年,该文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如“自理论上言,则有新民固何患无新政府,而自事实上言,则必有新政府而后可得新民也”(《浙江潮》8期飞生文),等等。

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这两点都是与封建正统文学观念和封建史学观念相对抗的。

在戊戌变法时期,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曾提出语言与文字合一,实际提出了白话文问题,梁启超曾认为,“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与此大约同时,严复和夏穗卿在《国闻报》发表《附印小说缘起》(1897年)一文,阐明了小说的价值^①。戊戌以后,梁启超在日本带头提倡新小说,办专门杂志(《新小说》),自己既翻译又创作,大开时代风气,这是戊戌前后所谓“诗界革命”^②“小说界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延续。到了二十世纪初,以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902年开始发表在《新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1901—1905)、《文明小史》(1900年出版)、刘鹗的《老残游记》(1903年首刊于《绣像小说》)、曾朴的《孽海花》(前十卷1905年出版)等为代表的小说作品,浩浩荡荡,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学巨流,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冲破了传统封建文艺,属于资产阶级文艺范围。在这股潮流中,梁启超以其在《新小说》创刊号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成了它的理论代表和领导人物。梁在此文中提出了文学(小说)为革新社会服务的根本观点和纲领。梁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文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

① 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说,“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膏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

② 谭嗣同、夏穗卿等人以新名词入诗,黄遵宪以时事入诗,当时号为诗界革命。

欲新人格必新小说,……”^① 梁说明了小说所以能吸引人的原因即它的感染力的特点(“熏”、“浸”、“刺”、“提”),和它激励人影响人的巨大作用。梁进而指出中国社会思想意识中各种落后的迷信的东西,无不与小说的影响有关。因之要改造社会,变革思想,移风易俗,必须改革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这些说法当然既浅薄又片面,但它提出的是为人生而艺术反封建传统的理论。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时革命派中好些人倒是以提倡国粹、复古以作为民族主义,无论是章太炎、邓实等的《国粹学报》或宁调元、易旭等人的南社诗歌,以及苏曼殊的古文小说,尽管也风行一时,尽管他们在政治上主张革命、崇拜卢梭,但在文艺形式上和历史观点上,却反而是相当保守的。因此,即使在1903年以后,革命派在政治思想上已逐渐全面战胜了梁启超,但由于没有自觉抓紧思想启蒙工作,这个领域就还是基本为改良派所占据,大部分文艺刊物和小说创作大都出自改良主义者之手,梁启超仍然留下了很大的影响。正有如当年亲身经历的人所说,“《新小说》的影响还是存在,因为对抗的同盟会在这一方面没有做什么工作”(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这些改良派的小说由于其主要内容是揭露封建官场以及社会现象的腐败黑暗,尽管思想上有很大局限,但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主要还是积极的。包括当时林琴南的翻译,也是这样。林琴南的政治思想是很落后的,但他翻译的大量西方小说却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知道除了《水浒》、《红楼》、《西厢》、《牡丹》之外,还别有天地在,西方资产阶级的生活内容、社会状况以及题材、形式等等是如此新鲜而动人,当时起了耳目一新的广泛进步影响。“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最嗜好的一种读物,……他在文

① 可比较鲁迅当年观点:“……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化,必自科学小说始”(《日界旅行·弁言》,1903年)。

学上的功劳,就和梁启超在文化批评上的一样,他们都是资本制度革命时代的代表人物,而且是相当有些建树的人物。”(郭沫若《少年时代》)。

革命、反满是当时时代的最强音,革命派站在这一政治思想的前列,但在启蒙工作方面却把阵地让给了改良派。因为后者无论如何比封建主义要进步,所以它在这方面又仍然可以在社会上起巨大影响和作用。历史的复杂性经常如此。

与这种文艺思潮并行,梁启超在本世纪初提出了与封建史学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史学观,也属于启蒙范围。史学在中国整个学术领域素来具有重要地位。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论文中尖锐批判中国封建史学传统,指出中国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因此把历史弄成了帝王家谱,“邻猫生子”,没有理想,没有规律,没有“群体”,二十四史只是一部相斫书。梁启超提出要用“新史学”来代替它,这种“新史学”必须写出人群进化和历史事件的因果法则,他说“历史者,叙述人群之进化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新史学》)。“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学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降替,虽名为国史,不过一人一家之谱谍,近世史家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中国史叙论》)因之,要着重种族、地理、文化等等,而不是一姓的兴衰,英雄的成败。他说,“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新史学》)这是与以帝王将相为历史主体的封建史学不相同的新史学观,它的进步在于它是当时整个启蒙思想与传统封建意识对立斗争的一个方面和一种表现。如同梁启超把改革小说上纲到政治高度一样,他也把这种新旧史学观念的对立提到同样的高度,

说：“呜呼，史学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唯大”（《新史学》）。

梁启超的启蒙宣传虽浅但广，虽杂但博。他不是重要的思想家，没有多少独创性的深刻思想成果。但他从宣传一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到提倡资产阶级的“新小说”“新史学”，自觉注意了意识形态方面与中国传统观念作斗争，在这方面他比当时任何人所做的工作都要多，起了广泛和重要的社会影响。他是当时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这就是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主要地位之所在。

三 新史学的代表人物

如果说梁启超是资产阶级史学一般理论和方法的倡导者，那么王国维则是这一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运用者。梁启超本人尽管写了有关中国学术史的大量论著，但真正能运用近代方法去进行分析综合，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和具有独创性的学术作品，却并不多。《清代学术概论》大概是梁最成功、影响也最广的学术著作了（六十年代仍有外文译本出现），但此书最精彩最有价值的部分仍在描述他亲历的晚清阶段。所以，尽管一些人把梁的学术建树和成就捧得很高，其实并不符合事实。王国维恰好相反，他没有大谈史学理论和方法，他不是什么宣传家、思想家，更不是政治家，他只是一个专门学者，接受他的名字和影响的圈子相当之小。但是他却以近代资产阶级科学方法对中国历史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创造性的重要成果。梁启超在理论上要求与几千年的传统史学划界线，王国维则在具体研究中履行和实现了这一点。无论从题材的选择，论证的办法，追求的目的，得出的结论，都与传统史学确乎迥然不同。他注意从社会制度、经济、文化等等方面探求历史的客观因果，

而不同于封建史学的片断考证和帝王家谱。他开创性地研究了封建社会无人过问的宋元杂剧,写了《宋元戏曲史》,郭沫若曾把《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相提并论^①,并认为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更重要的学术成就是对殷周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如郭沫若所评定:“他对甲骨文的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郭沫若:《历史人物·鲁迅与王国维》)。本文没有能力也不拟具体谈论这些成果,要指出的只是,他所以取得这些成果,完全在于他接受了当时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哲学理论到文艺作品的熏陶,特别是经过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训练。他研究过西方哲学和社会学,翻译过形式逻辑书籍,所有这些才使他能突破传统史学的方法,对中国古史能具有一种新眼光和新看法,使他的学术成果不但大不同于乾嘉考据之类,而且也比同时的革命派人物如章太炎要深刻和新颖。章太炎也写了大量有关中国古代文化的专题论著,但始终没能摆脱旧樊篱,甚至固执到不相信出土的甲骨,与王国维用近代方法去整理古史研究甲骨的态度大不一样。

王国维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浸染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唯心主义,但他清醒地看到“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他知道他所爱的唯心主义哲学是并不可信的,从而把自己的主要力量献给了可信的历史科学。也正是由于他有这种西方文化的素养和态

① “王先生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历史人物·鲁迅与王国维》)。

度,使他的《人间词话》^① 虽然似乎只是零星论评断简残篇,却仍然成为闪烁着光华的中国近代屈指可数的美学著作。在中国文艺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总之,如梁王两人相较,社会影响上,梁远甚王;学术成就上,梁不及王。在整个历史地位上,梁当然在王之上。但如果说梁启超的启蒙影响虽广泛,毕竟只在一时;那么王国维的学术成果,却虽专门而影响更为长久。二十年代清华研究院的三巨头——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是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前的史学主要代表^②。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思想上以及文艺上都在五四运动前后就逐渐取得主导地位,但在史学方面,则是在三十年代才达到这一点的,它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代表开始了史学领域内的马克思主义的进军。

总括上面,本文认为梁启超、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和学术领域中的主要代表人物。由于中国近代思想集中在社会政治领域,他们两人的代表地位和时代意义在康、孙、章等巨大身影的遮掩下,显得暗淡得多。但因此而完全忽视和否定他们,则歪曲了历史本来面目。

① 王在哲学上一方面不满足严复那种肤浅的经验论,提倡超一时功利的形而上学,指出中国民族缺乏抽象思辨,“吾国人之所长宁在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之知识为满足”(《静安文集》下同)。“故吾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最先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比严复更深一层的水平上了解西方文化、追求精神价值、批判故国传统以迎接新的世界;但另一方面,王又对中外哲学对理性、人性善恶的形上思辨予以健全常识的经验反对,这终于使他陷入“可爱”抑“可信”的矛盾中而离开哲学,这一矛盾是有深刻理论意义的。王对时人哲学的评论颇准确,表现了他的高度哲学素养,如他只提严、康、谭三人,认康为泛神论,谭半是唯物论,半是神秘论等,一语中的,超过今日好些论文。

② 这也就可说明,二十年代初梁启超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何能再三翻印,受到社会热烈欢迎。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兴起后,梁的影响就迅速消退了。